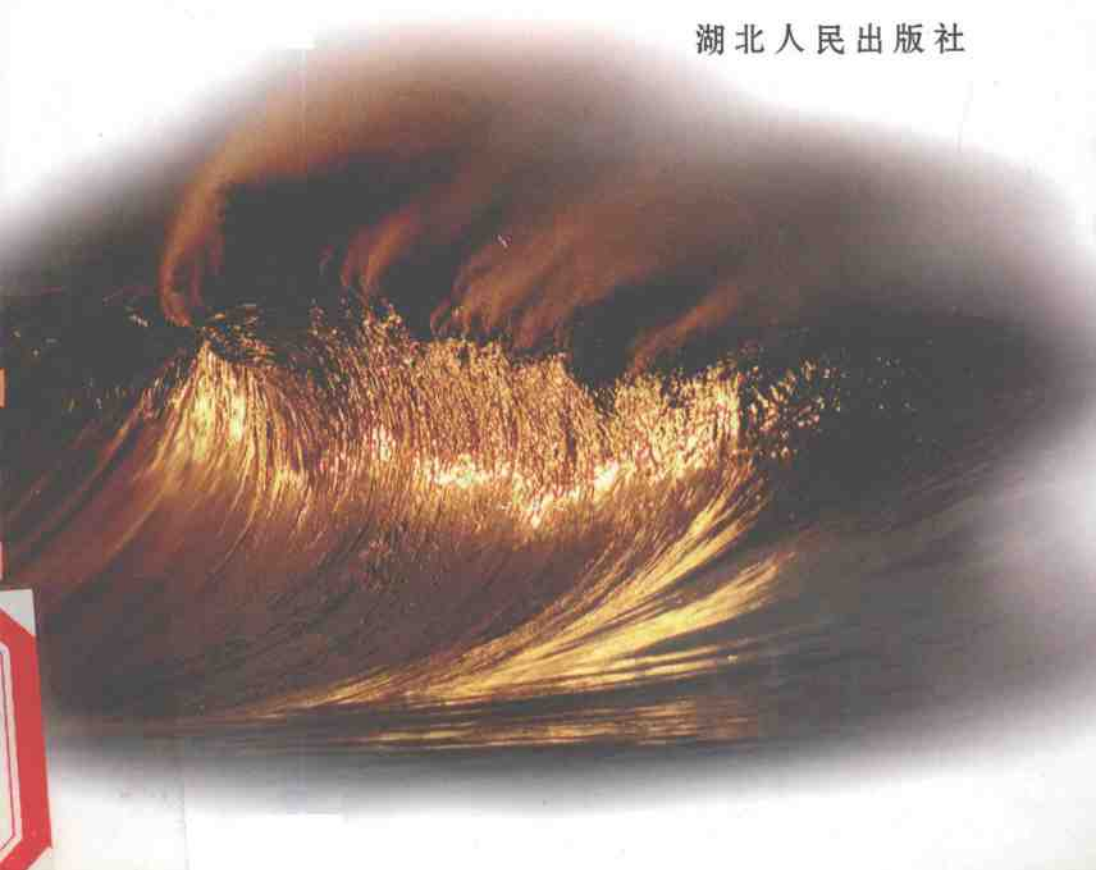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政治思潮

zhongguo
xiandai
zhengzhi
sichao

黄岭峻 何卓恩 邓亦武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代政治思潮

黄岭峻 何卓恩 邓亦武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政治思潮/黄岭峻,何卓恩,邓亦武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2

ISBN 7-216-04287-5

I. 中…
II. ①黄…②何…③邓…
III. 政治—思潮—研究—中国—现代
IV. D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5089 号

中国现代政治思潮

黄岭峻 何卓恩 邓亦武 著

出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安陆市鼎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267 千字

版次:2005 年 2 月第 1 版

印数:1—2 000

书号:ISBN 7-216-04287-5/D·680

印张:10

插页:4

印次: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2.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目 录

第一章	新权威主义思潮与现代中国	(1)
第一节	新权威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最早传播	(2)
第二节	新权威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发展	(9)
第三节	中国现代新权威主义的特点	(44)
第四节	新权威主义与中国现代政治(上)	(51)
第五节	新权威主义与中国现代政治(中)	(64)
第六节	新权威主义与中国现代政治(下)	(79)
第七节	古德诺政治思想探微	(88)
第二章	自由主义思潮与现代中国	(99)
第一节	自由主义在中国现代思想界的最早传播	(100)
第二节	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发展	(109)
第三节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特点	(135)
第四节	自由主义与中国现代政治(上)	(160)
第五节	自由主义与中国现代政治(下)	(174)
第六节	自由主义思潮战后在台湾地区的延续与演变	(182)
第三章	实用主义思潮与现代中国	(196)
第一节	实用主义在中国现代思想界的最早传播	(197)
第二节	实用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发展	(209)
第三节	中国现代实用主义思潮的特点	(221)

第四节 实用主义与中国现代政治(上).....	(236)
第五节 实用主义与中国现代政治(下).....	(249)
第六节 论白坚武的转变	
——一个价值相对主义含混性的实例.....	(264)

附录: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两种经济思潮	(279)
一、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统制经济”思潮	(279)
二、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经济民主”思潮	(298)

后记.....	(315)
---------	-------

第一章 新权威主义思潮与现代中国

在各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大都存在过一种特殊的权威政治形态,学界称之为“后革命型”权威政治。就这种权威政治具有不同于旧专制政治的现代化导向而言,人们又称之为新权威主义。这种权威政治的特点是:首先,它在经济上具备一定的现代化导向,对西方资本与先进技术和文化采取开放的政策。政府制定的经济发展方针,倾向于发展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诱导、支持和促进社会内部独立的实业家阶级的形成和发展,并借助这一个把外部现代文明移入内部的现代化承担者阶级的自主活动,来实现传统社会的经济变迁和组织结构的分化”^①。其次,这种权威主义在政治上凭借庞大而有效的官僚体制及强有力的军事力量,进行铁腕统治。为了保持政治上的稳定,新权威主义的政治军事强人甚至不惜采用高压手段来镇压政治上的反对派。而在意识形态上,则更多地认同传统价值体系,以之作为自上而下整合社会秩序和凝聚人心的基本手段。传统专制权威主义对传统的价值体系是在终极价值上,在“天经地义”这一哲学层面上加以肯定的,而新权威主义对传统价值体系则主要是在整合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秩序的功能意义上加以肯定的^②。“这种权威政治本身存在着两面性,一方面,当民主政治运作的条件尚不成熟时,以拒绝对权力进行监督为其基本特征的权威政治可以大大地降低政治综合所耗费的交易成本,并较为快捷而有效地实现命令贯彻、政治稳定与社会整

① ② 萧功秦:《萧功秦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合。另一方面,权威政治隐含的权力个人化倾向又是这种权力结构的必然伴生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权威主义可以说是一种两面刃,一种积极性与消极性同时并存而又不可分割的两面刃”^①。

在中国,新权威主义这个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以萧功秦为首的学者提出的。其实这种思想在清末民初的知识界早已经存在,只不过为激进救国主张所淹没,显得默默无闻。由于激进主义在思想界占据着主导地位,属于保守主义的新权威主义甚至被斥为反动的思想。

第一节 新权威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最早传播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剧烈转型,新旧社会结构交替,导致了严重的失序与混乱。中国的政治改革究竟应走怎样的道路?当时绝大多数精英分子激于亡国灭种的危机迫在眉睫,愤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与顽固不化,纷纷倾向于激进主义的制度决定论,即认为中国只要采取西方的先进制度,就能够实现富强,甚至认为采取的制度越先进,中国的富强就来得越快,而浑然不顾中国的国情是否与这些制度相适应。而另一部分精英分子则比较冷静,他们倾向于保守的新权威主义。19世纪末,中国著名思想家严复最早开始传播新权威主义。

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系统介绍西学、提倡资产阶级思想与文化的启蒙思想家、变法理论家、宣传家。他在《辟韩》一文中曾尖锐地批评了韩愈《原道》中君主专制的理论。翻译《天演论》,借助进化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发挥变法自强的主张。曾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但是,他关于中国究竟应走怎样的政治改革道路的观点,属于新权威主义的范畴。

严复认识到,中国的小农经济、家族制度、官僚制度、科举与儒家意识形态等社会因子,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每一因子功能的产生必须以其他社会因素的存在与发挥作用作为支持性条件。他指出,任何“治制之

^① 萧功秦:《萧功秦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

立,其法度隆亏不同,要皆如桥石然,相倚相生,更其一则全局皆变”^①。如果违背这一客观规律,引入一种缺乏支持性条件的新制度,就会出现“淮橘为枳”的状况。也就类似于“取骥之四蹄,以附牛之项领,从而责千里马,固不可得,而田垌之功又以废也”^②。严复又进一步从“体”与“用”的关系的角度来进行阐述:“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之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③所谓“体”就相当于一个社会的社会组织,“用”就相当于社会内部的各种制度,体与用是不可分离的。正是基于这一观点,严复批评了那种简单地认为,只须引进西方联邦共和政体,就可以实现中国富强的主张。他指出,由于在中国并不具备实行联邦政治的条件,如果推行“联邦”制度,最终出现的充其量只不过是“连横合纵”的“藩镇联邦”而已^④。严复还进一步批判了中国人在吸收西方文化方面的思维方法上的弊病:“大抵吾人通病,在睹旧法之敝,以为一从夫新,如西人所为,即可以得无敝之法。”甚至断言“专制末流,固为可痛,则以为共和当佳,而孰知其害乃过于专制”^⑤。其原因就在于,移植一种制度,如缺乏相应的条件,就会“迁地弗良”。因此,他认为,“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⑥。

既然,如上所述单独引进某一种西方新制度,没有支持性条件就不能成功。那么全盘引进西方文化与西方政治制度,又将如何呢?严复认为这样就必将导致“一行变甲,便思变乙,及思变乙,又宜变丙。由是以往,胶葛纷纭”的结果^⑦。换言之,要把西方先进制度所赖以生存的

① 王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58页。

② 同上,第560页。

③ 同上,第559页。

④ ⑤ 同上,第680页。

⑥ 同上,第240页。

⑦ 同上,第68页。

社会条件和因素全部引进,是不可穷尽的,也是不可能的。

基于此,严复还对当时流行的激进思潮进行了批判,指出:“为政之道,除旧布新,相因为用”,一种新的制度必须以从旧体制中找到的一种支持性条件为基础和前提才能发挥作用。而洋务派只是“务增其新,未尝一言变旧”,这样“专补不泻,日进参蓂”,终将导致“痼疾终不可愈,积邪日以益坚,而大命之将倾无日矣”的局面。严复还对戊戌变法人士不顾现实条件的限制,通过直接效仿西方的政教与制度来实现中国富强的主张进行了批评。他在《原强》中指出:“吾欲富强,西洋富强之政有在也,何不踵而用之。于是其于朝也,则建民主,开议院,其于野也,则合公司,用公举……于是而期之以十年,吾知中国之贫与弱有弥甚者。”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在几千年封建专制的压制下,已俨然一病夫,“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则有速其死而已”^①。也就是说中国这样一个积重难返多灾多难的民族是不可能通过简单地移植西方先进制度文明,来迅速地实现富强的目标的。

那么中国变革究竟应该走怎样的道路呢?严复认为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改革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必须循序渐进,否则将出现“颠阶譬乱,乃即在此为进之时,其进弥骤,其涂弥险,新者未得,旧者已亡,依俟无归,或以灭绝”的局面^②。因为,中国人的民主程度还非常低,而且不是在短时间内能够改变的,所以就不能激烈地大幅度地进行民主政治的改革,也就是说:“夫中国亲亲贵贵之治,用之者数千年矣,此中之文物典章与一切之谣俗,皆缘此义而后立。故其入于吾民之心脑者最深而坚,非有大力震撼与甚久之渐摩,无由变也。……独数千载受成之民质,必不如是之速化;不速化,故寡和。”^③那么,又具体怎样渐变呢?严复指出:“乃先之以导其机,必忍焉以须其熟,智名勇功之意之不敢存,又况富贵利行之污者乎?夫而后有以与时偕达,有以进其群矣。而课

① 王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页。

② 同上,第1242页。

③ 同上,第120页。

其果效，恶苦则取其至少，善乐则收其至多。噫！此轻迅剽疾者之所以无当于变法，而吾国之所待命者，归于知进退存亡之圣人也。”^①也就是从旧社会的机体内部吸取能支持变革的社会因子，使这种内部因子与从外界引进的新制度相结合，根据这种内部因子的发育程度来确定变革的深度与制度移植的程度。这样新移植的制度才有了赖以生长的土壤，才能在中国成活并发挥作用。

为新移植的制度提供生长土壤的旧社会机体中的支持性因子又从何而来呢？那就需要传统文化中的被严复称为“国性”的东西来作为培植中介。严复指出：“无机之物，则有原子，有机之体，则有细胞，原子细胞，皆为么匿。么匿——皆有相吸相拒之二力者含于其中，此天之所赋也。相吸力胜者，其么匿聚而成体，相拒胜甚者，其么匿散而消亡。国者有机体也；民者，国之么匿也；道德者，其相吸力之大用也。故必凝道德为国性，乃有以系国基于苞桑。即使时运危险，风雨飘摇，亦将自拔于艰难困苦之中，蔚为强国。”^②“国性”就是将一个国家或民族凝聚为一体的共同的文化、信仰、道德和风俗，“国性”是一个民族向心力的基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灵魂。那么，国性的具体体现是什么呢？是儒家的“群经”。正如严复所说：“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以经为之本原。乃至世变大异，革故鼎新之秋，似可以尽反古昔矣；然其宗旨大义，亦必求之于经而有所合，而后反之人心而安，始有以号召天下……至于人之所以成人，国之所以为国，天下之所以为天下，则舍群经之中，莫有合者。”^③所以，严复认为中国在实行政治变革时，仍要用儒家思想来整合意识形态：“今之中国，已成所谓共和，然而隆古教化，所谓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夫义妇贞，国人以信诸成训，岂遂可以违反，而有他道之从？假其反之，则试问今之司徒，更将何以教我？”换言之，他认为在改革的过程中，统治阶级仍必须用儒家思想来教化人民，国家政权仍

① 王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242 页。

② 同上，第 342 页。

③ 同上，第 331 页。

必须靠儒家意识形态来支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严复认识到,对一个国家的改革来说,“新”与“旧”都是需要的。因为“改革之顷,破坏非难也,号召新力亦非难也,难在乎亭古法旧俗,知何者之当革,不革则进步难图;又知何者之当因,不因则由变得乱”^①。

按严复的变革思路,中国政治改革具体措施应该是什么呢?

关于中国的政体,严复在辛亥革命前主张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前后反对建立共和制,帝制逆流甚嚣尘上时,赞同复辟帝制,但又认为袁世凯不能胜任皇帝。总之,一贯主张君主立宪。1906年严复著《宪法大义》,对君主立宪表示赞同:“乃今幡然而议立宪,思有以挽国运之衰颓,此岂非黄人之幸福!”^②在辛亥革命前后他对建立民主共和制并不同意:“东南诸公欲吾国一变而为民主制治,此诚鄙陋所期期以为不可者……”^③直至1920年严复仍认为共和制不适合于中国:“鄙人自始泊终,不以共和为中华宜采之治体,尝以主张其制者,为四万万众之罪人,九幽十八重,不足容其魂魄。”^④并且坚决断言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实行共和制反而给国家带来了负面效果:“自辛亥武汉造攻,不半载而变中国数千年之旧法,号曰‘共和’,虽一切外缘内因,举不备具,骤用新制,无异驭电车以行于蛾丛之区。”^⑤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公开化,严复对帝制本身很赞同,说:“复辟之议甚佳……”^⑥只是指出并没有适合的人来做君主立宪制下的总理,所以时机尚不成熟:“‘一线生机,仅存复辟’。但舆论以谓时机总未成熟,不系于宣统之长短,而系于总理之有无。今试遍观全国之中,欲觅一堪为立宪总理,有其资格势力者,此时实在尚未出现也。”^⑦严复甚至埋怨梁启超等人对清政府批判得太

① 王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6页。

② 同上,第245页。

③ 同上,第556页。

④ 同上,第711页。

⑤ 同上,第299页。

⑥ 同上,第639页。

⑦ 同上,第669页。

厉害,引起了民众的公愤,丧失了其统治的权威合法性,导致了灭亡,否则,保留满族皇帝,建立以汉人为主的责任内阁,实行君主立宪,“何尝不可以做到”^①。

关于统治方式,严复认为在民初社会一片混乱的情况下,政府应该收紧权力建立新的权威政治,指出:“以不佞私见言之,天下仍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何富强之可乎?”^②同时认为中国应该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指出:“共和前途,无论如何,必其中央政府真具能力,能以约束进退此等武人者,而后国事可云顺轨,长此终古,惟有乱耳,他无可言也。”^③特别强调在中央建立代议制并不合适,因为中国人没有建立政党政治的素质:“盖政治既为代表,则政党若不可无,于是有同盟,有国民,有共和,有统一。两年之间,名称屡易,组织纷然。顾自旁观者细察而微之,则其中知政党之为何物,能结合团体以催促政治之进步,不过居最少之数,而攀缘依附取利己之私,盖十八九。”^④严复还进一步指出,由于条件不具备,民初建立的政党政治出现了畸形化,给国家反而带来了灾难:“时事羌无佳耗,而政界及国会之惟利是视,摧折民生,殆吾国有历史来所未有。旧有风宪之官,言西法者以为非善制,今则以其权界国会矣。由是明目张胆,植党营私,当路之人,只须有钱以豢养国会中之党众,便可以诸善勿作,诸恶奉行,而身名仍复俱泰……今之民国已六年矣,而时事如此,更复数年,势必令人人亲受苦痛,而恶共和与一切自由平等之论如蛇蝎。”^⑤总之,主张在当时情况下,中国不应该马上在中央建立代议制。但是可以在基层先实行地方自治,培育人民的民主参政能力,以为渐进实现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而关键的必由之路:“地方自治之制,乃刻不容缓者矣。窃计中国即今变法,虽不必遽开议院,然一乡一邑

① 王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32页。

② 同上,第603页。

③ 同上,第669页。

④ 同上,第299页。

⑤ 同上,第662~663页。

之间,设为乡局,使及格之民,推举代表,以与国之守宰,相助为理,则地方自治之基础矣。使为之得其术,民气不必缘此而遂嚣,而于国家纲举目张之治,岂曰小补?……但使人人留意于种之强弱,国之存亡,将不久其智力自进,而有以维其国于泰山之安。且各知尊主隆民,为人人之义务,则加赋保邦之事,必皆乐于自将。”^①这样,就可以既不引起民众的过度参与而导致国家的动荡,又可以渐进地走向民主。

综上所述,在政治改革方面,严复主张在基层实行地方自治,在中央实行强权统治,以渐进地走向民主化的道路。而在经济上则主张发展资本主义。

“吾国方忧贫,而救贫非实业不为功。”严复认为中国积贫积弱,必须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从何入手呢?严复指出发展实业首当其冲的是修路开矿:“且道路不可不通,矿产不可不出;使吾能自通而自出之,将无事抵排,外力自消,内力自长;设不能自通自出,而仅言抵制,将抵制不成,成而病国益甚。”^②因为“盖铁路如人身之脉络,无脉络,则人身之气血不行,而枯萎之疾至;无铁路,则邦国之利源不广,而贫弱之患兴……铁路开,则诸矿业至于一切制造树艺之事,将相随以自生,而又于国家无大费”。而只有开采矿山,中国的无限宝藏才能得到开发。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中国还不能独资开发矿藏,因为“中国业路矿者,工师无多,而其人之阅历尤浅,则所为审曲面势,欲无滥费,亦无堕功,使路矿一切之政,在在皆协于无弊者,殆非今中国人之所能也。且国中殷实商民,其情皆疑而不任,必不肯出莫大之母财,企不可知之后利。故其集股也,法必以洋商之成本倡其先,而后国中商民信之,其股分乃可以踵至,此必然之理势也。”所以,应该借助外国的技术和外国的资本。但是“保持中国固有主权……路矿之机器材料,不可不力求其自供”^③。农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的基础行业,在发展路矿的

① 王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81页。

② 同上,第298页。

③ 同上,第105页。

同时还要重视发展农业：“夫中国，农国也，乃今耻为农，而必以工业与天下争衡者，震于外洋之物质文明，以为必如是而后可致富故也，而孰意不然。夫工业必资于原料，而原料，农业之所出也。使吾用其本有之知识，辟其素主之土地，善守其所得于天之分，先以原料生货之产，称雄五洲，则吾国不亦富乎！”^①然后，在路、矿、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而实业发展又必须依赖实业教育的发展，严复还提倡大力优先发展实业教育：“中国今日自救之术，固当以实业教育为最急之务……惟此乃有救贫之实功，而国之利源，乃有以日开，而人人有自食其力之能事。”^②

第二节 新权威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发展

严复的新权威主义思想在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中，启发了其他知识分子用相同的思路来思考中国的变革，20世纪初至30年代，中国的新权威主义思潮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梁启超、蔡锷、黄远庸、蒋廷黻等。

梁启超，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家、变法理论家、宣传家。梁启超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思想属于新权威主义的范畴。他的观点主要是：

（一）中国的政治改革势在必行

早在光绪二十二年梁启超就撰写《变法通议》，指出“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为也”^③。认为中国必须顺应历史潮流实行变法。光绪二十八年他在《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中，阐述了中国君主专制的种种弊端，如导致“一曰贵族专政，

① 王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8页。

② 同上，第204页。

③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页。

二曰女主擅权，三曰嫡庶争位，四曰统绝拥立，五曰宗藩移国，六曰权臣篡弑，七曰军人跋扈，八曰外戚横恣，九曰金壬峻削，十曰宦寺盗柄”，使各代皇帝及亲属屡遭杀身之祸。如果实行君主立宪制就能避免这些悲剧和弊端，“使非专制，则如英国日本之华族，给以爵号，优异齐民，其有功德有学识者，列之上议院，使参国政，而贵族专制之祸何从生焉。使非专制，则君位继承之法，一从宪法所规定，某人宜嗣统，皆与民共见，一定而不可易，虽或今帝无后，而旁支血统，循序入嗣，亦有皇室典范以划定之，而嫡庶争位定策拥立大礼争辩等祸何从生焉。摄政之权，皆有一定，元首权尚立限制，况于摄者，而母后擅权之祸，何从生焉。天演宗亲，各有食采，所至国人，莫不加敬，其尊荣虽下君主一等，而君位既无可欲，何苦贪此虚名，伤彼实例，则宗潢叛乱之祸，从何生焉。政府大臣，皆有责任，稍失輿望，立即去位，权臣篡弑之祸，何从生焉。兵马之权集于中央，国防之责，同诸国民，而军人跋扈之祸，何从生焉。一国会计，皆由议院审定，司农少府，各异所司，而峻削之祸何从生焉，君之与国，截然两途，宫中府中，不同一体，君主若有所亲，若有所爱，则自以其私产豢养之，不得及国事，而外戚横恣宦寺盗柄之祸，从何而生。不宁惟是，君主既与国民共治此国则君位之安危，与国同体，苟有人焉，欲破坏秩序，侵主权以毒一国者，则全国之民，皆将起而抗之。”^①所以，梁启超认为君主专制必须废除，君主立宪势在必行：“然则为国民者，当视专制政体为大众之公敌，为君主者当视君主政体为一己之私仇。按诸公理凡两种反比例之事物不相容，则必有争焉，争则旧者必败，而新者必胜。专制政体之不能生存于今世界，此理势所必至也。”^②

（二）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该渐进

中国的政治改革势在必行，但究竟应走怎样的改革道路呢？梁启超在清末民初不同的历史时期始终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走渐进的道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0页。

② 同上，第101页。

路。

清末新政前期

梁启超认为在当时的世界潮流下君主立宪是最好的政体：“今日全地球号称强国者十数，除俄罗斯为君主专制政体，美利坚法兰西为民主立宪政体外，自余各国则皆君主立宪政体也，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民主立宪政体，其施政之方略，变易太数，选举总统时，竞争太烈，于国家幸福，未尝不间有阻力，君主专制政体，朝廷之视民如草芥，而其防之如盗贼，民之畏朝廷如狱吏，而其疾之如仇寇，故其民极苦，而其君与大臣亦极危……是故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①但是中国还不能马上立宪，“中国最速亦须十年或十五年”，“自下诏定政体之日始，以二十年为实行宪法之期”。不过在实行君主立宪之前应早做准备，即“行之在十年以后，则定之当在十年以前”^②。

梁启超又指出，在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之前的准备期，中国应该实行开明专制。什么是开明专制？梁启超认为，国家统治只要做到对内调和竞争，对外助长竞争，那便是开明专制。具体地说就是，规定每人都各自有自由活动的范围，不至发生冲突，虽然，人人都受到限制但仍有自由竞争的空间，国家不妨碍国民正当的自由竞争，即使妨碍国民正当的自由竞争，甚至剥夺国民大部分以致全部的自由，只要是出于保卫整个国家的利益不得已而为之，仍然是开明专制^③。为什么当时的中国适合实行开明专制呢？通过梁启超的研究证明，开明专制最适合的情况是：

1. 一个新的国家刚刚成立时，“组成国家之各分子尚未为确实之结合”，如果不用开明专制进行整合就有分裂的危险。

2. 当贵族豪强相互争霸，无视国法，无视中央权威，妨碍国家统一之时，如果不实行开明专制进行统属，国家就将瓦解。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北京：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1 页。

② 同上，第 3 页。

③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北京：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21 页。

3. 长期处于“不完全的专制”的国家最适合实行开明专制,因为不完全的专制,等于无意识的放任,国家没有强制力,人民就不会守秩序,而且长久地受到无意识的放任,人民与国家之关系必将浅薄,关系既然浅薄,那么人们就不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国家的大小政务,一旦实行君主立宪,突然给人民以参政权,他们就会不知所措,如果实行开明专制,反而可以对他们的政治能力进行锻炼^①。

4. 长期处于“野蛮专制”的国家最适合实行开明专制,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人民可以自由行动的范围非常狭小且不正确,所以人民常常习惯于谋取个人私利,而没有公利公益观念,而且总是用险诈卑劣的手段侵害他人,这样的人民绝没有享受自由的资格,所以,实行开明专制正可以矫正这种现象。

5. 刚刚经受破坏的国家最适用开明专制,一个国家刚刚经受破坏之后,社会各阶级间,各团体间,各地方间,个人之间,常常发生种种利害冲突,不可能自动调和,以恢复秩序,只有用开明专制进行整顿,否则行将亡国。

6. 民智幼稚的国家宜实行开明专制,因为民智幼稚,国家就需要对国事多加干涉。

7. 幅员太大的国家宜实行开明专制,因为幅员广大区域界限分明,难以被中央政府所统一,所以应用开明专制来进行统一。

8. 种族繁多的国家宜实行开明专制,因为各族人民往往注重本民族的利益,而忽视国家的利益,冲突频仍,易致分裂,所以应用开明专制来融合种族。

清朝光绪年间,1、3、4、6、7、8点所列举的情况都是存在的。因为,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统治中国的既是野蛮专制也是不完全的专制;到了光绪年间清王朝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已经衰落,出现了内轻外重的局面,地方督抚专权的苗头已经显现,相当于贵族争霸;中国也的确民智幼稚、幅员广大、种族繁多,所以中国应该实行开明专制。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8页。